

1307



邵武文史资料

第 2 辑

政协邵武县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第二辑

1983年4月

马祥兴和邵武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李良寿(1)

何汉烈士被难经过.....石芋(5)

追忆父亲何汉烈士.....何圣慈(6)

丁超五先生传略.....丁日初(8)

丁超五先生事略拾遗.....邓次侯(12)

鄢汉屏先生事略.....邓次侯(15)

冯超骧在邵武.....石芋、冯玉昆(18)

吴慕唐先生事略.....邓次侯、王义(19)

税关上的对联.....周人杰(21)

陈荣标开烟放赌抽花捐.....谢宝琳(22)

东门浮桥建造始末.....邓次侯(24)

邵武中小学教育沿革概述.....李德午(26)

记樵川中学一次抵制日货行动.....李云青(35)

邵武的三角戏与三角戏剧团	张四维 (36)
三都明墓及古尸	何圣庠 (44)
民国建国三十八年中邵武历任行政	
长官政绩简介	李德午 (46)
大革命时期的邵武农会	周人杰、王义 (53)
姚宁两派之爭	吴 钟 (55)
抗战时期邵武的伤兵	孙治鑫 (60)
二十年代的兵乱和邵武兵站	李 杖 (64)
罗姚二匪陷城惨剧	冯玉琳 (67)
“紫云黄氏”的开山祖黄峭	沙剑萍 (69)

马祥兴和邵武第一个共产党小组

李 良 寿 整 理

邵武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于一九三〇年六月，翌年七月，由闽北分区决定升为特区委。邵武人民在特区委领导下，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和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斗争，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后来中央红军解放邵武县城，各区、乡大都能迅速建立起革命政权，为开拓闽北苏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回忆党在邵武初期活动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马祥兴同志，邵武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是和他分不开的。他是江西弋阳人，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到三十余岁还是个光棍。一九一六年移居邵武，在水北街赁屋居住，靠帮工打杂生活。当时，军阀割据在他们的统治下，贪官污吏互相纠结，任意搜刮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给地主马襄臣当长工，劳累了好几年，仍是两手空空，一九二二年又回到江西老家。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家乡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没办法只好又来邵武。在回邵途中，经朋友介绍，与横峯一位离了婚的中年妇女占秀英结成夫妇。夫妻俩在水北街搭了一个茅屋，租了几亩田耕种。一九二五年春，突患丝虫病，不能下田劳动，经征得占秀英的同意，将其前夫之子滕信谷从横峯叫来，帮助料

理农事，他自己在朋友的帮助下，与人合夥贩牛。

一九二六年秋，赣东北党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在弋阳、横峯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声势很大，马祥兴正好贩牛到这里，亲眼见到农民运动的胜利，认识到穷人要翻身，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回到弋阳，也积极参加了农民起义团。“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各地反动势力向革命进军，弋阳、横峯的同志被迫退向山区。马祥兴回到邵武，仍以贩牛为生，这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时也以贩牛为掩护，给山里的同志捎带一些急需的日用品。一九二九年春，邵武义记煤矿派人到上饶、弋阳、横峯等地招雇矿工，马祥兴也随这批同乡应雇进入矿山。从矿工的议论中，他获悉弋阳、横峯一带武装斗争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消息，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鼓舞下，他离开了煤矿，积极侦察邵武敌情，并在几个知心的穷朋友中，秘密传播赣东北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革命斗争取得不断胜利的喜讯。当时，弋阳、横峯经常有人来找他，他为了掩护前来的同志，把占秀英的儿子滕信谷搬到离邵武城只五华里的洪家寨（即现在水北公社畜牧场所在地）居住。这个地方只有几户贫苦农民，一无地主，二无保甲长，江西来的同志在这里不会引人注意，而且四而环山，敌人来了，容易退却。

二

赣东北党委非常重视邵武地理和革命形势，因为邵武是闽赣苏区的这沿，又是江西入闽的交通要道，邵武能打通，就可将闽北与赣东北联成一片。

一九二九年秋，赣东北的党组织派了共青团员兰小妹到邵武，找到了马祥兴，马即将他安排在滕信谷家中，以做工为掩护，开展秘密

活动。同年冬，又派来共产党员谢细崽（马谢是同村人），马祥兴把他们安置好了以后，仍以贩牛为掩护，经常与赣东北、闽北党组织联系。一九三〇年春，闽北苏区派杨振新来邵武协助工作，他们在马祥兴的熟人中，以交朋友，结拜兄弟的方式，逐个地发展了滕信谷、高春生等为党员，吴来荣、范伙子为团员，马祥兴自己本人，也在这时加入共产党。谢细崽同志还经常与他们接头，布置一些任务，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与考验。

三

一九三〇年六月的一个深夜，在洪家寨滕信谷家的楼上，谢细崽同志召集党、团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谢细崽、杨振新、马祥兴、滕信谷、高春生、兰小妹、吴来荣、范伙子等人，会议是在当地村民早已熟睡之后秘密举行的，到会的同志，吃过鸡血酒，宣过誓，选举出谢细崽为党的小组长，兰小妹为付组长。邵武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就这样诞生了。

党小组成立后，开始深入农村进行活动，有时，白天侦得了恶霸地主的消息后，晚上就去“打土豪”，得来的浮财秘密地救济贫苦农民。一九三〇年冬，党小组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由杨振新领路，从建阳界首的江坊走小路到这崇安，向分区委汇报工作，受到了分区委书记黄道同志热情的接待和指示。回来后，党小组在闽北分区委的领导下，秘密地组织群众抗粮抗税，深得群众的拥护。在一连串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向反动派进行武装袭击。一九三一年六月，伪政府有几个税警到石窟村去催收税款，党小组便组织了十余人，拿着柴刀、扁担，装做砍柴，埋伏在路这，等税警一个个过去，当最后

两个走近时，突然冲出将其杀死，缴了两支步枪和子弹。这次斗争的胜利，武装了自己，也使自己得到了锻炼。

为了扩大影响，邵武特区委把人员分成三组活动；杨振新在水北洪家寨一带，马祥兴在城关，谢细崽在建阳界首。由于他们已经在群众中作了不少工作，当中央红军一九三二年十月解放邵武之后，各乡、区大都能迅速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发展游击队组织，对巩固闽北苏区起到一定作用。

(接第5页) 来，回家时只在家吃了一顿饭，脚上还有一只镣铐没有卸下，又忙着去为红军筹钱筹粮。他在红军建立邵武苏维埃时没有公开露面，主要在面区活动。

红军撤离邵武，何汉没有走，当时反动势力气焰嚣张，尤其地主武装还乡团，更是到处骚扰。他暂时躲藏在南门外的岳母家，恰好十九路军的一个团长也住在那里，何汉便经常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和工农红军的政策，谈论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鬼子的情况，企图争取这个团长为红军工作，这样过了二十多天，却被恶霸何清知道了，乃向反动派告密，驻军56师刘和鼎部派兵包围何汉住处，就这样，他又再一次被捕了。

敌人残酷地刑讯，始终未能从何汉口中得到有关面区革命组织的底细，最后无可奈何，便决定将他杀害。

1934年初（民国癸酉年十二月初五日），年仅三十六岁的何汉，被绑赴刑场枪决，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武装、闽浙赣三省剿匪总司令刘和鼎处决的共有十三人，都以“赤匪首犯”名义杀害，本地人只何汉一个，他被绑赴刑场时，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路旁的群众，都被他的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精神感动得暗暗流泪。

何汉烈士被难经过

石 芋

何汉烈士，别名寿新、号巨川、又名克昌、邵武沿山乡古山人，延平省立第四中学毕业后，又参加延平建安道地方自治讲习所学习。1923年邵武设立县地方自治讲习所时，他担任过讲师，还当过小学校长，胸怀大志，是个有为的青年。因为很早就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是那一时期的新派骨干，所以也成了地方巨霸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1年2月，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亲自率领红军向建宁挺进，开辟以邵、太、建、黎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邵武的金坑和黎川的熊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开展分田斗争。以沿山何汉，台上朱沂为首的新派骨干，也前往金坑熊村等地联系，谋求在邵武西区开辟革命根据地，西区新派人士经常在古山何汉家集会，进行革命活动，并将邵武敌人的情况，向金坑熊村汇报。当时沿山至金坑路上已出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这就是何汉等新派干的。

不久，何汉的堂兄何大鸿（也是新派骨干），被沿山巨霸所暗杀，敌人的暴行，更加坚定了何汉为革命工作的意志。但是，地方巨霸何清对何汉也不轻易放过，加紧在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何汉等人原计划在西区举行一次暴动来迎接金坑的红军，不幸尚未实现就于1932年3月一次由黎川工作返里时，在金坑至沿山途中遇到反动派途捕，扣押在邵武县城监狱里。是年冬红军解放了邵武县城，才从监狱中出（下转第4页）

追忆父亲何汉烈士

何 圣 慈

民国癸酉年十二月初五，即公元1934年1月，这天我亲眼看到年仅36岁的父亲何汉，被万恶的敌人绑赴刑场残酷杀害。这事距今将近五十年，但血海深仇，永世难忘。

在这天下午未时，国民党“闽浙赣三省剿匪总司令”刘和鼎，集合成千人马，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将十三名被其逮捕的所谓“赤匪首犯”的衣服脱光，五花大绑，押赴本县西门外石桥旁处决。其中除我父亲是本县人氏外，其余十二人皆外省之人。当时我三十二岁的母亲拉着才十一岁的我和七岁的弟弟，三人跌跌撞撞地赶到县衙门口，便见到我父亲，他排在最后一个。在这时刻，眼睁睁的看着骨肉亲人生离死别，这种人世间极端悲惨的情景，是笔墨无法记述的。我们母子三人，万刀穿心、悲痛欲绝，嚎啕大哭。而我的父亲却西不改色，大声劝慰我母亲：“不要哭、哭什么！好好带大两个孩子、要报仇、要报仇……”话未说完，便被万恶的刽子手将咀塞住，当时两旁群众个个都被他慷慨就义的精神感动得暗暗流泪。

十三位革命者被害后，敌人意犹未尽，更惨绝人寰地将烈士遗体剖腹挖心。我母亲见状，便不顾一切地扑在我父亲身上，死死抱住，才得以保全他的遗体，而其余十二颗血淋淋的红心全部被那帮狼心狗肺的强盗挖去吃掉。

我父亲生前曾几次被捕，家也几次被抄洗，连鸡狗也不留，所以生活无着，度日艰难，在这极端贫困的境况下，父亲的遗体是靠几位亲友凑了一点钱，买了一口仅九寸宽的棺木勉强收殓的。但母亲始终不肯将他埋葬，也不肯把棺木封口，只是将灵柩抬回安放在离我家住房约100公尺的寮厝里寄存，同时还做了一个灵位牌，但不公开安放在厅堂中，而是安在自己臥室里。我们兄弟二人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总是说：“一定要等到出头之日，把仇报了才安埋入土。”所以父亲的灵柩就这样整整放了六年，也就是在母亲病故前一个月才安葬。那个灵牌还是母亲病故后，连同她的灵牌一起焚化掉的。

父亲是被以“赤匪”罪名杀害的，我们家也就成了“匪属”，母亲成了“土匪婆”，我兄弟二人成了“土匪子”，那时到处受人歧视，苦不堪言。所以，母亲的死，虽说是病死，其实是气死。她死时还只有三十八岁，没等到出头之日，也没亲眼看到报了仇，就含恨离开我们。

解放后，告密的恶霸何清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我父亲被评为革命烈士，我们家也成了光荣的革命烈士之家。现在，我们的子女有的入了党，有的大学毕业，生活过得美好，若是父母有灵，他们必定会含笑于九泉。



丁超五先生传略

丁 日 初

丁超五先生是福建省邵武县人，生于前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毕业于福州格致书院。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是时丁先生已经深切认识到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确为中国所需要，毅然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参加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以及中国国民党，一直在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民主革命。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袁世凯用威胁利诱的方法，逼迫议员选他为总统，当时议员坚持不屈仍然投票选举中山先生者仅有十三人，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丁先生追随中山先生到广东任大元帅府参议。其后陈炯明奉中山先生命进军福建（当时陈炯明尚未背叛革命），有一部份本省同志不明大体，公然倡议反对。丁先生认为这是违反孙中山总理的意旨，若将国民党仅有的武力摧残，无异摧残国民党复兴之机，坚持异议。

一九二一年（国民十年），中山先生派丁先生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福建省主盟人”。一九二三年，丁先生复反对曹锟贿选，间关南下。翌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丁先生由孙中山总理指派为福建省三代表之一。第二次及第三次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到第四次大会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丁先生热诚拥护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及其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一九二六年，丁先生奉国民党中央之命为驻闽特派员，秘密自广东回到厦门，主持全省党务。同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国民革命军光复福建后，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兼福建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及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自订会计章程，财政绝对公开，故能弊绝风清。以后办政办党都如此办理。一九二八年，中央常务委员会推他担任临时特种刑事法庭庭长，当时委员亨颐曾经对人说：“我相信丁超五不会冤枉人。”丁先生自己也对人家宣称：“就是我的仇人，也不要害怕我，我是不会冤枉人的。”结果丁先生真没有虐待过一个人，或是害死过一个人。

一九二九年，丁先生续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三一年春被派赴四川省视察国民党党务，这是国民党中央派大员进入四川省的第一次。丁先生在四川省拒绝接受赈仪，有余的旅费也吩咐经手的人交还国民党中央，由此可见他的廉洁作风。自蜀返京后，丁先生当选为中央训练部副部长，后递补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是年，国民政府又特派丁先生赴南洋视察侨务，宣慰侨胞。在南洋时，丁先生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极为愤慨，当时曾密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团结党内，联络苏联，共同抗日。他在菲律宾曾出席华侨举行的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说，鼓励华侨拥护政府，抵抗日本，当场获得华侨的捐献不少。

回国后，丁先生在上海与许翼公，吴山（四川人）等同志，组织中韩民众大同盟，并派金仲文（原名奎植，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副主席）赴美国作同样的组织，鼓吹韩人联合抗日。后来又与许、吴等从事国民外交，派曹励恆氏到苏联去，要求：（一）准东

北游击队入境；（二）给他们以便利；（三）卖枪械给他们。苏方表示须先恢复邦交，丁先生等遂在国内作此鼓吹。嗣后中苏恢复邦交时，苏联曾经宣布说：“中苏邦交的恢复，是基于人民的愿望。”或即指此而言。同时丁先生又在上海与台湾同胞谢南光同志组织华联通讯社，丁先生任该社董事长，谢南光任社长，专事供应抗日通讯稿件，藉以激扬全国人民抗日情绪。

一九三三年，丁先生受命为立法委员。一九三四年主持江西国民党党务，全力整顿，秩序井然。一九三五年任监察院江苏区监察使（辖区包括南京、上海两特别市）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先是日本侵略日亟，丁先生曾与孙科、李烈钧、冯玉祥等在某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共同提案建议我国应参加法苏协定，以救危亡。倘蒙采纳，可能如孙科先生所说的：“七七事变，不至发生。”（语见《申报》）惜乎本案竟未提会，而被京之高阁。

抗战期间，丁先生随国民政府西上，初居昆明，后迁重庆，寓於峨眉山及重庆南温泉，潜心研究《易经》，用科学的方法，对于易卦作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著成《易理新论》一书，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奖金。一九四〇年因体弱多病，回故乡邵武居住，曾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创办赈济十四工厂，救济难民，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一九四六年三月，丁先生到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在某次宴会席上，丁先生曾发表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感想，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定的条件都是我们所应该做而未做到的事。这次协商有了结果，就应该切实履行。”可惜以后政治协商会议归於失败！

是年四月，福建省参议会正式成立，丁先生为大多数参议员推选

为议长。在参议会里，丁先生站在民众立场说话。第三次大会时，丁先生倡导恢复和平、实行民主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通过。在第五次大会上，他主张政府必须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演词，引起全省民众的激动，而且得到省外舆论的赞扬。

至于丁先生的做人做事，以及他的日常生活，也有足述处。他从政数十年，不贪污、不腐化、不树立派系、不讲地域关系，实行兼差不兼薪。不论从政办党，对于公家财物的处理完全公开，所以某同志曾经说过：“丁先生生平做事，不要用国家一文钱，不要用一个私人。”实是信而有徵。他日常的生活非常有规则，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钱，唯一的嗜好就是酷喜读书，一天不读书，就觉一天白过。在一九四〇年丁先生未病之前，每晨起未必须用冷水摩擦全身，从无间断。他对待朋友非常有信义，不轻于然诺，可是一经答应了人家，就非尽力替人家做到不可。他非常遵守时间，因为他不愿意浪费别人的时间。他非常爱护青年，因为他认为青年是时代的继起者，他给他们以同情，鼓励他们求上进。

〔本文作者系丁超五先生之子，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



丁超五先生事略拾遗

邓 次 侯

1927年国民党“宁汉合作”后，丁超五先生由汉口到南京。当时，他对国民党内左右派之争，未作明确表态，故当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两派互争庭长职位而坚持不下时，乃共推丁先生出任该庭庭长，以缓和两派之争。1929年特刑庭撤销后，没有再委他工作，实际是无事可做，只当了一名光头的中央委员。不久，他到上海养病，住北四川路海宁医院，彷徨焦闷，常去找黄农谈心。有一次他在黄农处阅读了中华革命党组织者谭平山所写的《科学的三民主义》一书，觉得谭在书中所阐述的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很合自己思想，乃要求与谭会而。因当时我在上海江南学院读书，是中华革命党总部交通，黄农经我介绍，已加入该党。此时黄将丁的要求告诉我，要我设法让丁见谭。我便将此情况向谭平山报告，谭欣然愿见。于是在约定的时间，丁超五先生由黄农陪同，在我居住的亭子间里会见了谭平山，原来谭、丁在北伐时便已认识，此次见而，双方各抒久别之情，气氛十分融洽。谭向丁介绍中华革命党的宗旨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科学的三民主义。他回顾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和蒋介石叛变革命使北伐战争流产的历史事实，指出现在需以科学的三民主义为指南，联合国内外革命志士，共图大业，革命才能成功。又谈他原是研

究自然科学的，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领导中华革命党感到力不从心，好在邓演达先生即将回国，可以将粗具规模的党交他继续努力，完成革命大业。当时，丁对谭所论，表示折服，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慨。

第二天黄农对我说，昨晚他送丁超五回家，丁十分激动，虽已深夜，仍要黄农再座谈一时。丁表示中国革命有谭平山的领导，前途大有希望，对谭的坦率、自知之明和礼让贤才的品格，尤为敬佩。

不久，邓演达回国到上海，接收了中华革命党全部组织。在谭平山离沪后，又将党改组，并由中央召集的十八省市代表大会讨论，将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政治主张及革命行动月刊。当时邓分配我为上海青年支部负责人之一，并负责中央干事会的通讯联系、交通工作。丁超五听到邓演达已回上海，便托我转告，要求与邓会面。邓工作繁忙，嘱我先将政治主张及革命行动月刊送丁阅后再约期会晤，丁欣然接受，并将书刊藏在自己枕头下，以便夜深人静时潜心阅读。丁向我介绍说，他在广州、武汉时，均与邓有交往。当时邓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毫无倦容，且为人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随军北伐，途中每次重大战役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享有很高声望，是个文武全才，党国栋梁，当之无愧。

十几天后，丁由我陪同，会晤了邓。当时丁向邓表示赞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认为这个主张符合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即以工农为中心联合广大平民群众，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于是要求加入组织，为革命效力。邓接受了丁的要求，嘱丁填表，履行入党手续，并面嘱福建华侨众多，要丁在闽籍华侨方面多

做些工作。这次会晤后，丁对人表示，他十分赞同邓的理论，以为邓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且身体壮健，中国革命大有希望。不久，丁又介绍黄琬（字孟圭，华侨，前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入党。

1931年夏，有部份华侨捐资兴学，计划在上海创办一所大学，委托邓先生主持一切。当校舍及设备筹办就绪后，便决定登报招生，校名定为华东大学。校长人选，一时尚未找到。邓先生嘱我找丁超五谈，拟请他担任校长职务，看他表示如何？我马上去找丁，转达邓的意见，丁听了之后，立即应允。我将此回报邓，邓即囑筹办人员设宴招待丁先生，并克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招生广告。

丁超五先生就任上海华东大学校长后，委派黄农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负责主持一切日常工作，并将私章交给黄农。

登报招生月余，报名男女青年将近千人，眼看入学考试日期快到，报纸却突然刊登一则上海市教育局就此事呈报中央的消息，内容大意说：查上海新办的华东大学，内部主要教职员多系不纯分子，希图赤化青年，请中央严加制止，勒令停办等语。丁超五闻报后极为忿怒，打算向中央抗议。就在这时，中央却来电请丁晋京，说有要事面商。丁到京后，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出面与他谈话，以为教育事业已有专人负责，劝他不必在上海创办华东大学；又说现在中央正有许多事要借重他帮忙，随即由中央委他为特使，到四川调解二刘斗争（刘湘与刘文辉）丁虽然明知这是国民党右翼企图阻遏进步力量，要弄釜底抽薪的阴谋，但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又无法断然拒绝这一使命，只好在即将动身去四川的时候，从南京打电话给黄农，说明原委，并请黄转告华东大学筹办人员，因他力不从心，表示歉意。

四川公事完毕回京后，又作为中央特使被派往

下转第17页